

柳敬亭:从历史人物到戏曲人物

郭园兰

(湖南大学文学院,湖南长沙,410082)

摘要:《桃花扇》在追求历史真实的同时,注意艺术虚构,虚实结合,戏剧与历史达到了完美统一。具体到柳敬亭形象的塑造,剧作者一方面使柳的说书技艺及滑稽、刚强、仁义的心性与史实相符,另一方面则或移植史实,或实中写虚,或以虚写实,在请缨、入狱、归隐等情节中加入了较多的虚构成份。戏剧与历史中柳敬亭形象的异同,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剧作者取舍材料的匠心及其超人的史识艺胆。

关键词:孔尚任;《桃花扇》;柳敬亭;历史人物;戏曲人物

中图分类号:I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06)05-0610-05

《桃花扇》具有强烈的历史真实感。孔尚任自云:“《桃花扇》一剧,皆南朝新事,父老犹有存者。”^{[1](小引)}其中“朝政得失,文人聚散,皆确考时地,全无假借。至于儿女钟情,宾客解嘲,虽稍有点染,亦非乌有子虚之比”^{[1](凡例)}。作者唯恐人们不明白其写作意图,又借剧中人物老赞礼反复交代,《桃花扇》一剧“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实事实人,有凭有据。老夫不但耳闻,皆曾眼见”^{[1](试一出·先声)}。这种据史写实的创作方法得到后世不少批评家的肯定,著名学者吴梅就认为,《桃花扇》一剧“虽科诨亦有所本”,“语语可作信史。自有传奇以来,能细按年月确考时地者,实自东塘为始。传奇之尊,遂得与诗文同其声价矣”^{[2](118)}。尽管如此,笔者认为在欣赏《桃花扇》,分析其思想艺术时,仍然应该重视剧中的虚构与“点染”,重视考察戏曲人物与历史人物的同与异。剧中人物上至帝王将相,下及复社文人、歌妓艺人,历史上虽然都实有其人,但是他们的生活经历与思想性格已经经过艺术的处理,因而二者之间不能盲目地划等号。譬如侯方域,剧中将其结局写成归隐栖霞山,就与历史不符,历史上的侯方域明亡后曾复出应清朝科举。柳敬亭形象的塑造也存在着这种情况,实中有虚,虚中寓实,虚实结合。本文拟对此略作分析,借以管窥《桃花扇》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确考时地”而又“稍加点染”的艺术特色。

其思想性格,这也是柳从历史人物走向戏曲人物的基础。

其一,技艺超轶。柳敬亭的说书技能,在他生活的时代曾经赢得普遍的赞誉。张岱称赞柳氏说书“入情入理,入精入骨,摘世上说书之耳,而使之谛听,不怕其不齟舌死也”^{[3](147)}。龚鼎孳曾绘声绘色地描述柳敬亭说书的影响力:“稗官抵掌恣旁唐,顿挫纵横善用长。”^{[4](卷三十二《康熙庚戌秋冬存稿近稿·赠刘叟敬亭同诸子限韵》)}著名学者黄宗羲一方面认为柳氏“琐琐不足道”,批评吴伟业所作《柳敬亭传》对柳氏评价过高,一方面又在自己改写的《柳敬亭传》中极力称赞柳氏的说书艺术,认为听柳氏说书会使人感到“亡国之恨顿生,檀板之声无色。有非莫生之言可尽者矣”^{[5](23)}。《桃花扇》保留了柳敬亭作为杰出说书艺人的基本特点。剧中指出“柳敬亭说书最妙”^{[1](6)},知名度很高,不仅深受下层普通民众的喜爱,而且“曾见赏于吴桥范大司马、桐城何老相国”^{[1](6)},诸如此类的描写与历史事实极为吻合。黄宗羲说,柳敬亭“名达于缙绅间。华堂旅会,闲亭独坐,争延之使奏其技巧,无不当于心称善也”^{[5](22)}。而据余怀、吴伟业的记载,柳敬亭在南京时,确曾得到兵部尚书范景文、礼部尚书何如宠的赏赞,并被两家“引为上客”^{[6](99)[7](1056)}。

其二,诙谐滑稽。王国维曾在《古剧脚色考》中论及作为戏曲人物的柳敬亭的滑稽气质。他说:“如孔尚任之《桃花扇》,于描写人物,尤所措意。其定脚色也,不以品性之善恶,而以气质之阴阳刚柔,故柳

《桃花扇》写柳敬亭是以历史事实为依据的,戏曲中的柳与历史上的柳具有较多的共同点,尤其是

敬亭、苏昆生之人物,在此剧中,当在复社诸贤之上,而以丑、净扮之,岂不以柳素滑稽、苏颇倔强,自气质上言之当如是耶?^{[8](196)}柳敬亭性格诙谐滑稽,常常于说笑揶揄之中打击阮大铖之流,赢得了复社文人侯方域等人的连连称赞,所谓“敬老妙人,随口诙谐,都是机锋”^{[1](40)}。剧中柳敬亭还自诩为“诙谐玩世东方老”,致书辕门,劝说左良玉不要挥师东下。左良玉称他为“滑稽曼老”,认为他“胸次包罗不少,能直谏,会旁嘲”^{[1](76)}。诙谐滑稽的性格为柳敬亭的政治活动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剧中所写柳氏的政治活动未必与史实一致,但其诙谐滑稽的性格特点却极为吻合。据相关文献记载,历史上的柳敬亭很早就以滑稽闻名于时。冒辟疆诗云:“游侠髯麻柳敬亭,诙谐笑骂不曾停”^{[9](11)};陈维崧诗云:“此翁滑稽真有神,少年超捷矜绝伦”;王猷定写得更具体:“英雄头肯向人低,长把山河当滑稽;一曲景阳岗上事,门前流水夕阳西”^{[10](3)}。柳氏诙谐滑稽性格的形成可能与他作为一名说书艺人的社会身份和生活经历密切相关。

其三,有胆有识。戏剧中的柳敬亭与历史上的柳敬亭都具有性格刚强、有胆有识的特点。譬如剧中写柳敬亭见左良玉,面对左良玉的长刀大剑,威严气势,柳敬亭从容唱道:“俺是个不出山老渔樵,那晓得王侯大宾客小。看这长枪大剑列门旗,只当深林密树穿荒草。尽着狐狸纵横虎咆哮,这威风何须要。偏吓俺孤身客无门跑,便作个长揖儿不是骄。”^{[1](75)}显得镇定自若。这件事在吴伟业的《柳敬亭传》中也有记载。吴伟业这样写道:“左以为此天下辩士,欲以观其能,帐下用长刀遮客,引就食,座客咸振慑失次,生拜乞,索酒,谈啁谐笑,旁若无人者。左大惊,自以为得生晚也。”^{[7](1056)}这就是大家熟悉的“长刀遮客”的故事。对此,龚鼎孳亦有词云:“片语回春,千金逃赏,遮客长刀玩弄来。堪怜处,有恩门一涕,青史难埋。”^{[11](《沁园春赠说书柳叟》《沁园春·和曹实庵舍人赠柳叟敬亭》前阙)}可见,不论是历史还是戏曲中,柳敬亭都是一个有胆有识、性格刚强的人。

其四,至仁至义。这一点最突出地表现在柳氏与左良玉的交往中。历史上,柳敬亭对左良玉的感情确实很深。钱谦益有《左宁南画像歌为柳敬亭作》^{[12](275)}一诗,从诗中所述二人的交往来看,柳敬亭在左氏死后,逢人即说左氏故事,甚至还可能将左氏生平事迹编成弹词用于说书。吴伟业《柳敬亭传》中亦云:柳敬亭“每被酒,尝为人说故宁南时事,则欷歔洒泣”^{[7](1058)}。顾开雍《柳生歌》序中说:“柳生还吴

中,酒酣时向人说宁南事,闻者皆涕下。”所谓“逢人剧说故侯事,涕泗交颐声堕地”(顾开雍《柳生歌》)。左、柳二人的这种感情在《桃花扇》中亦有所反映。续四十出《余韵》就特别写到柳敬亭掩泪感叹:“左宁南是我老柳知己,我曾托蓝田叔画他一幅影像,又求钱牧斋题赞了几句;逢时遇节,展开祭拜,也尽俺一点报答之意。”^{[1](261)}柳敬亭对左良玉的知恩图报之心,从一个侧面表现了他至仁至义的人格个性。

上述前二者突显了柳氏的技艺,后二者突显其人格,均体现了戏曲人物柳敬亭与历史人物柳敬亭相统一的思想性格。正是这些相同的特点,决定了柳敬亭形象的历史真实性,集中体现了孔尚任“确考时地,全无假借”的创作精神。

二

戏曲创作毕竟不是历史研究。郭沫若曾经指出:“历史研究是‘实事求是’,史剧创作是‘失事求似’。”^{[13](44)}戏曲创作在忠于历史事实的同时,必须去掉一些偶然性的东西,虚构一些必要的情节和细节,通过“失事”以“求似”,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反映历史的本质真实。具体到柳敬亭形象的塑造,孔尚任并没有拘泥于一般的历史事实,而是结合具体的历史情境,根据创作需要,或虚构情节,或移植史实,在不影响历史真实性的前提下,进行了一番艺术加工。

其一,移植史实。《桃花扇》中的柳敬亭保留了历史人物柳敬亭的热情性格,但其热心、热情所施的对象却不同。在《桃花扇》中,柳敬亭与苏昆生一道,在侯方域、李香君之间充当牵线搭桥的重要角色,所谓“巧柳苏往来牵密线”^{[1](2)}。剧本第三十九出《栖霞》还特别写到他与侯方域一起避难栖霞山。按照剧中的描写,柳敬亭是侯方域的大恩人,两人的关系非常密切,从情理上讲,他们的这种交往在侯氏文集应该有所反映,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我们读遍侯氏的《壮悔堂集》,书中竟然没有一字涉及柳敬亭其人。而历史上的柳敬亭确实是一个热心之人,只是所帮的对象不是侯方域而是他人,其中有杜浚。杜浚有《今年贫口号》二十四首^{[14](13)},第二十二首云:“中秋无食户双扃,叩户为谁柳敬亭;亟送酒钱仍送酒,真教明夜也休醒”;第二十三首云:“封题凛凛太

周详,醉后重看笑一场;多少同人称厚道,来伴未免詈商鞅”。两首诗后面都有注,前诗注云:“中秋日一粥,闭门睡矣。忽闻呼门声,乃柳叟敬亭走力送酒并青蚨一千,想外格外,感而有纪。”后诗注云:“中秋明日,几上再见敬亭来札,封函下方有八字云:‘来人受赏,我就天诛。’始悟昨者平头逃去之故,不觉与客大笑。又成一绝。”按照杜诗及注的记述,柳敬亭对朋友的帮助彻底周到,派人送酒送钱,还特意强调“来人受赏,我就天诛”,意思是不要给来人任何脚力钱。这对于一贫如洗的杜浚来说,无疑是无微不至的关怀。柳敬亭的这种侠骨热肠曾经赢得许多朋友的高度评价。官至尚书的龚鼎孳曾著文赞扬他“生平重然诺,敦行义,解纷排难,缓急客倚伏,有古贤豪侠烈之风”^{[15](42)}。清人夏荃认为:“(敬亭)侠骨热肠,求之士大夫中不可多得。”^{[16](236)}《桃花扇》写柳敬亭竭尽全力帮助侯方域,将发生在杜浚等人身上的故事移植嫁接到剧中主人公侯方域身上,这种移植以事实作基础,具有历史的合理性。

其二,实中写虚。《桃花扇》中柳敬亭的“两次请纓”包含着较多的虚构成份。《桃花扇》中有柳敬亭两次请纓的情节。第一次在第十出《修札》,柳敬亭自愿去左良玉幕府下书,阻止左良玉东下就粮南京^{[1](69)}。第二次见于第三十一出《草檄》,柳敬亭为救侯方域自告奋勇替左良玉赴汤蹈火传檄文。柳氏主动请纓之举赢得了剧中人物的普遍钦佩。杨文驄夸他“好个本领”,“是个有用之才”;侯方域称他是“我辈中人,说书乃其余技耳”;袁继咸和黄澍视之为荆轲一类的人物,必恭必敬地以白衣冠之礼送别柳敬亭;就连左良玉也拜跪奉酒,连声称赞柳敬亭为“义士”“壮士”。为了突出柳氏的英雄气概,作者将请纓送别的场景写得异常悲壮,极尽渲染之能事。

其实,《桃花扇》对柳敬亭两次请纓之举的描写都夸大了柳氏在当时政治进程中的作用,包含着较多的虚构成份。就第一次请纓而言,作者有意识地改写了柳敬亭与左良玉的遇合之因。据吴伟业《柳敬亭传》记载“宁南伯良玉军噪而南,寻奉召守楚,驻皖城待发。守皖者杜将军宏域,于生(指柳敬亭,引者注)为故人。宁南尝奏酒,思得一异客,杜既已泄之矣。会两人用军事不相中,念非生莫可解者,乃檄生至,进之。”^{[7](1056)}黄宗羲所作《柳敬亭传》中亦说:“宁南南下,皖帅欲结欢宁南,致敬亭于幕府。”^{[5](22)}

可见,柳敬亭与左良玉的遇合是因为守皖将军杜宏域的推荐。杜之所以介绍柳敬亭与左见面,一方面是想满足左得“异客”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缓解和左良玉的矛盾。柳敬亭就这样来到了驻守武昌的左良玉幕府中。至于剧中所写柳敬亭劝阻左良玉不要率兵东下,是否实有其事不得而知。可以肯定的是,柳敬亭以一介艺人阻止左良玉如此重大的军事行动,与情理有些不合。而据《明史》记载,左良玉率兵东下,震动朝野,兵部尚书熊明遇请侯恂转圜,移书阻止,北掌院李邦华路过湖口,责备左良玉不顾大局,并发九江库银十五万,为左军补足了六个月的粮草,左良玉这才退兵^{[17](6845~6846)}。就第二次请纓而言,历史本事与剧中的描写更是存在着天壤之别。据黄宗羲《柳敬亭传》的记载,柳敬亭“尝奉命至金陵,是时朝中皆畏宁南,闻其使人来,莫不倾动加礼,宰执以下俱使之南面上坐,称柳将军,敬亭亦无所不安也。其市井小人昔与敬亭尔汝者,从道旁私语,‘此故吾侪同说书者也,今富贵若此!’”^{[5](22~23)}显然,柳敬亭去金陵,是奉命行事,而不是请纓,其目的是为了消除左、阮之间的嫌隙,充当“释嫌”的差使。而阮大铖出于对左良玉的畏惧,对柳敬亭非常客气,柳敬亭最终完成了任务。历史上的奉命“释嫌”到戏剧中变成传檄“讨伐”,这大概就是作者在《桃花扇·小引》中所说的“稍加点染”。

其三,以虚写实。为更好更深入地塑造人物形象,揭示人物性格,作者在剧中艺术地虚构了一系列场景和情节,达到了以虚写实的创作效果。比如,剧中虚构了柳敬亭入狱后的场景。在《桃花扇》中,柳敬亭为救侯方域替左良玉传声讨马、阮的檄文,结果锒铛入狱。《会狱》一节,极力渲染柳敬亭入狱后的场景,这纯属虚构,目的在于突出柳的乐观主义精神。再比如,剧中虚构了柳敬亭归隐的情节。《桃花扇》续四十出《余韵》写柳敬亭归隐为渔父,常与隐居做樵夫的苏昆生煮茶闲谈,一次忽遇衙役访拿隐逸之士,柳、苏等人“登崖涉涧,竟各逃走无踪”^{[1](261)}。如此作结,纯粹是为了全剧情节的完整和人物性格的统一,与历史事实则有较大的出入。明亡之后,柳敬亭不改明代衣冠,体现了一种不做清朝顺民的民族气节。其时,满清政府厉行“剃发令”,到处张贴“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告示,禁止百姓穿戴明代衣冠,柳以说书艺人表演古人的需要为由一直留

发不剃,借以寄托故国之思。至于归隐,则纯属作者虚构。据黄宗羲《柳敬亭传》记载,明亡之后,“敬亭丧失其资略尽,贫困如故时,始复上街头理其故业。……马帅镇松时,敬亭亦出入其门下,然不过以倡优遇之”^{[5](22)}。可见,柳敬亭并没归隐,而是重操说书旧业,而且后来还加入了降清官员马逢知的幕府,只是颇不得志。此事在吴伟业、余怀等人笔下亦有记载。柳敬亭明知马是叛明降清的军阀却去投靠,这使他的人格大打折扣。晚清经学家皮锡瑞在和金德瑛《观剧绝句》中讥讽柳氏说:“各负夷齐爱国心,首阳薇蕨竟难寻;柳生晚客云间帅,试问入山深不深蕨阳家三。”更有甚者,清康熙元年,柳敬亭还曾随显宦蔡士英北上(王沅《漫游记略》卷二《燕游》三),他甚至不顾人们的讥刺,与当时一些降清官僚如钱谦益、龚鼎孳等来往密切,种种迹象表明,柳氏在明代灭亡之后,忽东忽西,颇有趋炎附势之疑。

三

上述戏史差异的存在,从表面上看似乎拉开了戏曲人物柳敬亭与历史人物柳敬亭之间的距离,其实恰恰体现了作者追求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相统一的努力。作者既尊重史实,“实事求是”,又改造、虚构历史,“失事求似”,颇具匠心地真正做到了“确考时地”又“稍加点染”。他为什么这么做,笔者认为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为了塑造一个完美的柳敬亭人物形象,寄托作者的政治理想和良好愿望。在《桃花扇》塑造的众多人物形象中,复社文人侯方域、手握重兵的左良玉、军阀习气十足的高杰和黄得功、哭哭啼啼的史可法等人,固然各具面目,但就其形象的完美程度而言,都不如妓女李香君和艺人柳敬亭、苏昆生等社会下层人物。柳敬亭既才艺卓越、滑稽刚强,又至仁至义、知恩图报、侠骨热肠、胸襟洒脱、乐于助人、英勇无私、奋不顾身,富有民族气节。为塑造一个完美的柳敬亭,作者以历史人物柳敬亭的生平事迹与思想性格为基础,选择性地演绎史实,好的方面就实事求是,而对于有损这一光辉形象的不好的方面则加以改造、虚构,诸事为我所用,使柳敬亭形象的塑造既源于生活,又超越了生活,从中不难看出作者的爱憎和价值取向。孔尚任认为,明清之际,朝代更替,民

生苦楚,柳敬亭这类下层人物具有优秀的品质,负有救国救民的光荣使命。南明覆亡,正如夏完淳所言,是由于“朝堂与外镇不和,朝堂与朝堂不和,外镇与外镇不和;朋党势成,门户大起,虏寇之事,置之蔑闻”^{[18](3)}。弘光帝、马士英、阮大铖等人“私君,私臣,私恩,私仇”^{[19](122)},皆为一己之私利,而柳敬亭这样身处下层的艺人,在国家灭亡的危急关头,反而义字当头,精忠报国,其人品较之衮衮诸公要高尚得多。孔尚任虽然出身于封建地主阶级家庭,但一生中经历过隐居、出仕、又隐居的三次波折,官场生活使他目睹了上层社会的黑暗、高贵者的堕落和腐败。他因参与疏浚黄河入海口工程,在淮扬一带生活三年,历经磨难,深入体会到下层生活的疾苦,平民意识大大增强,类似柳敬亭的“下层人物”在其心目中留下了美好的印象。而其间结识明末遗老,凭吊先朝遗迹,更是激起了身系汉族臣民的孔尚任对故国满怀拳拳眷恋之情、故宫禾黍之悲,并由此对朝廷产生失望、不满甚至抑郁愤激的情绪。正如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中所指出的,“剧中形成的贵贱颠倒的对比,不只是表明孔尚任突破了封建的等级贵贱观念,其中也含有他对尊贵者并不尊贵、卑贱者并不卑贱的现实的愤激情绪,以及对此所作出的思索”^{[20](290)}。或许正是这种思索,使他像钱谦益一样感到“卿大夫之不足恃赖,优人之不足鄙夷”,从而将关注的目光转向柳敬亭之类的下层下物,并对他们寄予厚望。

二是为了发挥柳所扮角色在剧中的作用,更好地突出戏剧主题,集中剧情。《桃花扇》以侯、李爱情为主线,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柳敬亭在剧中主要起穿接场面、联络主角、推动情节的作用。剧中柳氏交往的主要对象除了左良玉以外,就是侯方域和李香君了。出于剧情结构的需要,作者有意识地将历史上柳敬亭与他人交往发生的许多故事巧妙地移植到剧中人物侯方域和李香君身上,为了减少头绪,突出主题,又尽可能将柳敬亭写成侯方域与史可法、左良玉之间联系的中间人,这样一来,柳敬亭就成了南明兴亡的亲历者和见证人,而要实现这一切,对这一形象的生活经历与事迹“稍加点染”就成为必不可少的了。茅盾在《关于历史和历史剧》中称赞,“《桃花扇》是我国古典历史剧中在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方面取得最大成功的作品”^{[21](102)}。这种统一主要是通过“确考时地,全无假借”而又“稍加点染”的

历史题材处理方法来实现的,柳敬亭形象的塑造是一个典型。

参考文献:

- [1] 孔尚任. 桃花扇[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
- [2] 吴梅. 中国戏曲概论[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 [3] 张岱. 陶庵梦忆[M]. 上海: 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6.
- [4] 龚鼎孳. 定山堂诗集[M]. 清光绪 9-10 年(1883-1884)圣彝书屋刻本.
- [5] 黄宗羲. 南雷文定前集十一卷 后集四卷[M]. 清康熙 27 年(1688)蕺治荆刻本.
- [6] 余怀. 板桥杂记[M]. 青岛: 青岛出版社, 2002.
- [7] 吴伟业. 吴梅村全集[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 [8] 王国维. 王国维戏曲论文集[M].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1984.
- [9] 冒襄(冒辟疆). 如皋冒氏丛书·巢民诗集[M]. 1902.
- [10] 王猷定. 豫章丛书·四照堂集·四照堂诗集[M]. 丁巳仲秋刊于南昌退庐.
- [11] 龚鼎孳. 定山堂诗余[M]. 民国 25 年(1936)上海中华书局铅印本.(四部备要·集部 上海中华书局据清光绪龚氏家刻本校刊.)
- [12] 钱谦益. 钱牧斋全集·牧斋有学集[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
- [13] 郭沫若. 历史·史剧·现实[J]. 戏剧月报, 1943, 1(4).
- [14] 杜浚. 变雅堂诗集十卷[M]. 清光绪 20 年(1894)黄冈沈氏刻本.
- [15] 龚鼎孳. 定山堂古文补遗[M]. 清光绪 9-10 年(1883-1884)圣彝书屋刻本.
- [16] 夏荃. 退庐笔记[M]. 台湾: 文海出版社, 1973.
- [17] 张廷玉. 明史[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 [18] 夏完淳. 续幸存录, 清刻本.
- [19] 孔尚任. 桃花扇[M].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7.
- [20] 袁行霈. 中国文学史[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
- [21] 矛盾. 关于历史和历史剧[M].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62.

Liu Jingting: From a historical personage to a drama character

GUO Yuanlan

(College of Chinese Lanuage and Literature ,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2 ,China)

Abstract: By paying more attention to both historical truth and arts fiction , Kong Shangren integrated historical truth with arts fiction perfectly in “ Peach Blossom Fan”. As for the design of the image of Liu Jingting , the author ,on the one hand , made Liu Jingting’s eloquence and his funny , firm , kind nature consistent in the historical truth . On the other hand he , added more fictitious elements to the plots of his assignments , imprisonment , quit , etc . through transplanting the historical evidence , fabricating the reality or inventing the reality . The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the image of Liu Jingting in the drama and history showed the author’s super techniques in choosing materials and his profound knowledge of history and art as well .

Key words: Kong Shangren ; “ Peach Blossom Fan” ; Liu Jingting ; historical figures ; opera characters

[编辑:汪晓]